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的演变阶段及特征研究

前言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历来都是国家重点关注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整理归纳法对1950年—2022年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整理归纳其演进特征并进行阶段划分。本文认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阶段可划分为:初步探索阶段、退中有进阶段、恢复发展阶段、改革转换阶段、巩固完善阶段。归纳出不同阶段具有学习与探索、因地制宜与军事色彩、体育教学“三基”目标下的“达标化”、身体素质化发展、健康第一和以人为本、制度化和体系化发展、上升国家战略、科技化研究等特征。

关键词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测试特征;演变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任领导人对学生体质健康问题高度重视,多次传达指导精神,以促进学校体育事业发展,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从“中发[2007]7号”文件到《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从普通意见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高度逐渐提升;从“身体素质化”到“健康第一”,核心理念与时俱进。纵观1985—2021年八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成绩发展轨迹,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呈现总体下降态势,虽近年有所上升,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在追溯演进历程中可以发现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和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与变换。但目前如何确定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发展历程的分界点,学界依然没有统一的定论^[1]。研究我国不同时期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演变过程,对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发展和测定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助力作用。

1 初步探索阶段(1950—1958年)

1.1 学习与探索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国以恢复生产力水平为发展目标,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没有条件大范围开展且缺乏经

验,且未建立学生体育制度,对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造成较大阻碍。由于我国当时普遍学习苏联模式,体育教育亦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我国体育工作人员到苏联学习和借鉴经验,其中《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初步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撑。1954年,我国《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暂行条例》颁布,并在国内综合条件较为具备的地方开始试行^[2]。在总结开展经验和吸取苏联《劳卫制》内涵精髓后,我国正式的《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于1958年由国务院颁布^[3],我国第一项正式体育制度由此确立。

1.2 因地制宜与军事色彩

由于当时百废待兴、强敌伺环的国情,《劳卫制》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军事防卫效率”,明确指出了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可以更好地参加劳动和保卫国家工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毛主席于1952年6月提出的助力新中国体育工作发展的口号,也确立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针并一直沿用。《劳卫制》中也增添了军事项目,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素质的同时,对基本的军事技能也有初步了解和掌握。《劳卫制》也根据我国经纬度

跨度大,气候和环境多样的特点,在不同地域开展不同的测试项目。因地制宜的原则促进了各个地区人员参与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的积极性,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拉开了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帷幕。

2 退中有进阶段(1959—1976年)

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此外,“大跃进”期间追求达标率、不科学训练等行为阻碍了《劳卫制》的推行与实施,甚至被迫中断。之后,为掌握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情况和促进学生健康水平恢复,国家重新开展了体质健康监测工作。周总理对我国的外交情况变化指示:为更贴合中国国情,将《劳卫制》更名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然而,刚恢复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随后被文化大革命活动中断。1971年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周总理肯定了“文革”运动前在体育工作上取得的成功,使得体育工作恢复进程得到促进。之后,1974年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锻炼标准》条例(草案)的通知”,通过各地各级积极建言献策、总结经验,国家体委于次年公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4],这也进一步标志着我国的学校教学工作得到恢复,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发展回归正轨。在此期间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虽然总体倒退但依然有发展之处。

3 恢复发展阶段(1977—1984年)

3.1 体育教学“三基”目标下的“达标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要将我国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由此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也得到了促进和助力。因新时代我国各方面国情转变,从坚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出发,以“三基”(基本技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学大纲为目标,删除军事技能测试,弱化了军事色彩。加入了体质健康测试项目和运动技能评价项目^[5]。强调体育测试的全面达标,代表学生是否能通过测试,而对于体育教学工作者是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参考依据。“达标化”是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评工作中使用最长时间的评价标准,在之后的改革中一直沿用,也是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

3.2 身体素质化发展

1979年,《中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研究》一文发表,使我国青少年体育工作者对青少年体质健康评价

有了新的认知。该研究以全国各阶段20余万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身体素质、身体形态、身体机能方面对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大致掌握了其体质健康水平概况。1981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分会成立,统筹体质健康测量研究工作,加快了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进程。“体质”一词在1982年的泰山会议上被明确界定,为学生的体能测试工作开展指明了以身体素质发展为主的前进方向。在实际测量工作中,测试指标遴选会将身体素质设为重点,对我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4 改革转换阶段(1985—2007年)

4.1 健康第一和以人为本

学生群体升学就业压力增加,文化学习将基本的体育活动时间挤占,使学生的体育活动量不足,致使其体质健康问题更加凸显。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99年6月发布的“中发[1999]9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为学生体质稳定提高、健康发展,应在体育教学工作中逐步树立“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该理念影响了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在之后的标准改革中有极其显著的体现。2002年吗,我国改为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从身体素质单项测试向身体素质、机能和形体三个方面拓展。并将小学阶段测试根据不同年龄段划分成高中低三个阶段,进一步细化小学生评价标准,更加贴合实际需要。新世纪以来,我国将国民素质发展工作的重心转到学生身上,以学生素质教育为根基,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指向,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为首要任务^[6]。

4.2 制度化和体系化发展

1985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以29个省市各个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体质调研。调研增加了体力、视力等指标,并建立5年一次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公报制度,通过1985年至今的8次全国普查得到了不断的完善。2000年开始与国民体质健康测试一并进行,建立了抽样系统、组织系统等9个系统组成的体质监测体系和监测公报制度,使各级管理机构和组织对大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把控更加准确。在21世纪初期,教育部印发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网络工作实施方案》同时也标志着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网络的建立^[7],形成了中央到地方分级管理的国民体质健康监测网络体系。在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库中直接存入学生体质健康数据,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发展提供了有力抓手和保障,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方法。

5 巩固完善阶段（2007 年至今）

5.1 上升国家战略

21 世纪以来, 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但学生身体健康状况总体明显下降。2007 年 5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学生体质健康工作也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为促使学生体质健康发展, 国家逐步展开各项体育工作及活动, 如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等, 对学生体育健康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2020 年 8 月, 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发布的“体发〔2020〕1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根据“一体化”原则需要重新强调“健康第一”等思想。这些举措显示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地位在不断上升。

5.2 科技化研究

随着科技发展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采用电子设备进行测试使数据更准确, 减少人工误差。国家对学生体质健康发展工作的投入不断加大, 并且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后确立了体育大国举步迈向体育强国的新目标^[8]。国家规划中将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作列入到科技支撑计划, 对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系统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9]。同时, 受近年来疫情影响, 以建设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

展专家公开课、课后服务与课程学习有机衔接等手段开展远程体育课程和测试, 进一步提升我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与测试的科学性、技术性, 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打开新局面。

6 结论

(1)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初步探索阶段(1950—1958 年)、退中有进阶段(1959—1976 年)、恢复发展阶段(1977—1984 年)、改革转换阶段(1985—2007 年)、巩固完善阶段(2007 年至今)。各阶段都根据时政国情进行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2)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制度的目的是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测试制度根据不同时期的教育目标有不同侧重点, 呈现规范化、完善化、科学化特征。但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为了发展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从而推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始终是国家的关注重点, 各部门相关政策不断出台, 使其地位不断提高^[10]。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与时俱进, 但是由于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评价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尚未得到良好的改善, 说明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尚有发展空间。

文 / 孟不凡 (又石大学, 韩国全州 565-701)

作者简介: 孟不凡, 男, 河北保定人, 又石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特殊体育、社会体育学。

参考文献:

- [1] 张强峰, 孙洪涛.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制度的演变 [J]. 体育学刊, 2016, 23(2): 29-33.
- [2]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关于公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暂行项目标准、预备级暂行条例的通告 [Z]. 1954-05-04.
- [3]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 [Z].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81 次会议, 1958-10-20.
- [4]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手册编写.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手册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5: 11.
- [5]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群体司.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手册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 5.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解读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66-85.
- [7]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群体司.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手册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 5.
- [8] 教育部.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评价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EB/OL]. [2008-04-14]. <http://www.csh.edu.cn>.
- [9] 苏坚贞, 陈曦.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区块链的平台架构、应用前景与现实挑战 [J]. 体育学研究, 2020, 34(1): 21-26+32.
- [10] 陈善平, 刘丽萍, 张中江, 等.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态度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7(2): 196-202.